

基层社会与国家权力研究丛书

李治安 主编

# 乡国之士与天下之士： 宋末元初江西抚州儒士研究

■ 周 鑫 著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古籍出版社



南宋时期江西抚州地图(根据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改绘)



元时期江西抚州地图(根据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改绘)

## 绪论

宋元易代是中国近世的大事因缘。检视宋末元初南方儒士的精神生活亦是元初以降士人学者一直关注的议题。长久以来,士人学者们立足儒士同王朝国家、儒学道统之关系,围绕忠宋节士与儒学正士两种理想模型,依循《忠义传》、《儒林传》的书写传统与近现代政治史、思想史的学术脉络建构宋末元初南方儒士的历史形象,书写其精神生活史。尽管随着行为理念、书写传统、学术脉络的各自发展与互动竞争,理想模型的功能意涵和人员构成时时变幻,宋末元初南方儒士的历史形象与精神生活渐次拓展,但围绕忠宋节士与儒学正士建构书写的研究典范始终没有突破。这一研究典范将研究视域主要投射至提倡实践忠宋节士与儒学正士两种理想人生的政治文化身份较重要的儒士身上,不仅将他们全部的人生定格为应对宋元易代的政治抉择与儒学道统的知行传承,而且大都从“忠君”、“正统”、“夷夏之防”、“道统”等较深层的政治伦理与儒学理念予以阐释。它既无视大多数普通儒士的活动,也忽略重要儒士在国家政治与学问道德之间与之外更丰富的精神生活,更甚少考虑政治伦理、儒学理念的多元与普及,现实利益,政治机会问题等。

20世纪70年代伊始,宋史研究者将目光投至地域社会,围绕儒士大夫参与地方事务、经营家族的日常生活构建其地方形象。尤其是韩明士(Robert Hymes)挾发的“南宋精英地方化”宏论,引发宋元史学界纷纷以家族为中心研究儒士大夫的地方行为。学者们也开始进入地域社会,观察宋末元初南方儒士的地方活动与儒学的地域流传。但人们习惯以家族为中心探讨其地方活动,以朱子学为中心建构儒学的地域流传,很容易陷入家族兴衰模式与朱子学道统系谱的窠臼,无法呈现儒士地方活动与儒学地域流传的多元面相。

本书主旨即以宋末元初江西抚州儒士为具体研究对象,透过全面稽考其在宋元易代和元初科举停废两大历史场景的言行事迹,突破元代以来围绕忠宋节士与儒学正士建构宋末元初南方儒士历史形象的研究典范,修正20世纪七八十年代兴起的从地域社会出发研究宋末元初南方儒士地方形象的实践偏差,重建宋末元初南方儒士在“乡国之士”与“天下之士”之间的精神生活史及其意义。

## 研究回顾

宋末元初南方儒士历史形象建构得最深入人心的首推忠宋节士。最早整理书写忠宋节士事迹的正是经历国变的宋末元初南方儒士。就在厓山败后的第二年,系狱幽燕的文天祥(字宋瑞,庐陵人,1236—1283)开始创作《集杜诗》,评述耳闻目睹的世变人事,追思死节守义的忠臣义士。文的好友邓光荐(字中甫,庐陵人,1232—1303)以《集杜诗》中十三首追忆殉节幕府宾客的绝句为蓝本,寻到四十名随从文天祥举

义抗元者的资料,撰就《文丞相督府忠义传》一卷。<sup>①</sup>文的同乡刘岳申(字高仲,吉水人,1260—1346?)参酌《集杜诗》中关涉文生平的段落,纠合其他史料,著《文丞相传》一卷。后至元年间,文天祥孙文富出任湖广行省检校官,礼请南游湖湘的前中书参知政事许有壬(字可用,汤阴人,1287—1364)作序,将其付梓。<sup>②</sup>龚开(字圣予,淮阴人,1222—1306)则选取文天祥另一篇自传性作品《纪年录》始末,撰《文宋瑞传》,同之前蹈海的乡宦陆秀夫(字君实,盐城人,1236—1279)所作的《陆君实传》并存。<sup>③</sup>龚开撰《陆君实传》时,曾央黄唐佐向邓光荐商借陆秀夫托授的手书日记。未得之余,他只好据辗转所闻立传。<sup>④</sup>

① “右信国公文集杜句二百首,皆在燕狱所作,每首有公自序。其后邓中斋撰督府忠义传、刘申斋撰公传,皆有资于此”,杨士奇:《东里集》(刘伯涵、朱海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卷十《跋文山〈集杜句〉》,第137页;亦见同卷《跋〈文丞相督府忠义传〉》,第152页。

② 刘岳申:《申斋刘先生文集》(元代珍本文集汇刊影印鲍廷博校明初钞本)卷十三《文丞相传》,第552—578页;许有壬:《至正集》(元人文集珍本丛刊影印清宣统三年聊城邹道沂石印本)卷三十《文丞相传序》,第159页。许有壬在序言中称:“孙富为湖广省检校官,始出辽阳儒学副提举刘岳申所为传,将刻之梓,俾有壬序之。三十年前游京师,故老能言公者尚多,而讶其传之未见于世也。”许大德五年荐入翰林,不报,客游京师数载,大德未得授开宁路学正,历经数官,元统二年拜中书参知政事,因与权相伯颜争科举行废事被辱,于后至元元年乞归,已而南游湖湘,六年复召入中书。据此推定文富刊刻《文丞相传》的时间最有可能是后至元年间。有关许有壬的生平出处大概,可参孙克宽:《元代汉文化之活动》(台北:中华书局,1968年)第四编《儒士及其著作》之《元许有壬及其至正集》,第419—423页。

③ “龚开曰:仆见青原人邓木之藏文公手书《纪年》,皆小草,首尾具备。因求得善本,取其首末为传,与赵、陆二传并存”,见程敏政:《宋遗民录》(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印明嘉靖二年至四年程威等刻本)卷十《龚开》“宋文丞相传”条,第9页上。龚开口中的赵是指北宋依智高乱中战死的淮阴人赵师旦,陆则指陆秀夫,二人皆为尽忠死节的乡宦。他前作的《陆秀夫传》,亦收入《宋遗民录》。

④ 程敏政:《宋遗民录》卷十《龚开》“宋陆君实传”条,第13页上。

黄潛(字晋卿,义乌人,1277—1357)读过龚开的《陆君实传》及其《辑陆君实挽诗序》。至大元年(1308),他游金陵时又从番禺客口中亲闻厓山事,斟酌去取,作《〈陆君实传〉后叙》。后入京师,见新修的《宋史》二王本纪同《经世大典》及邓光荐家后来呈上的《填海录》等书所载皆有异辞,遂摭取一二附注原叙之下。<sup>①</sup>元末陶宗仪(字九成,黄岩人,1329—1413?)辑《草莽私乘》时,又将龚开的两传一序作为忠臣传的代表收录其中。<sup>②</sup>

刘燠(字起潜,号水村,南丰人,1240—1319)亦以诗存史,赋诗十首,分纪李芾等十名殉国忠臣之事,作《补史十忠诗》一卷。其子刘麟瑞(号如村)复访到宋季一百三十余名死节义士的生平大节,包括参考《文丞相传》,志其遗事,赋律五十首,续作《昭忠逸咏》四卷。《昭忠逸咏》至治元年(1321)完篇,岳天祐至顺三年(1332)曾撰序以识观览。<sup>③</sup>尔后,乡人赵景良(字秉善)合《补史十忠诗》、《昭忠逸咏》二书为一,兼采汪元量(字大有)、方回(字万里,歙县人,1227—1307)诸公伤时悼亡

① 黄潛:《金华黄先生文集》(四部丛刊初编影印梁溪孙氏小绿天藏景元写本)卷三《〈陆君实传〉后叙》,第6页上一—9页上。黄潛读过《辑陆君实挽诗序》的证据是龚开详细讲述撰陆秀夫传的见闻来源不是在《陆君实传》中,而是《辑陆君实挽诗序》。

② 见陶宗仪编《草莽私乘》(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印清钞本)。此钞本前有钱谦益万历四十八年(1620)春、夏两篇序跋,乃钱氏之物,可参瞿镛:《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瞿果行标点、瞿凤起覆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卷十《史部三·传记类》“草莽私乘一卷”条,第263页。值得注意的是,《草莽私乘》不载陶宗仪著述之目,四库馆臣疑为明人伪托之作,见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卷六十一《史部·传记类存目三》“草莽私乘”条,第548页。

③ 赵景良编《忠义集》(汲古阁合订唐宋元诗集本)卷二《昭忠逸咏序》,第1页上一—3页上。

诗作再续两卷，编成《忠义集》七卷。<sup>①</sup>《昭忠逸咏》志事部分更被人单独抽出编成《昭忠录》一卷行世。<sup>②</sup>

除此数种存世的专传、合传外，又有若干散佚亡失之作。如元初名儒吴澄（字幼清，抚州崇仁人，1249—1333）为战死蜀地的宋勇胜军统制詹钧撰写墓表时提到，詹的儿子詹士龙大德五年（1301）曾借按访荆楚之机寻其父遗迹，“有宋士录国亡之际能城守野战死者，人各为传，而侯与焉。得其传”<sup>③</sup>。詹钧的名讳传记在现存的数种合传甚至《宋史》中均未见到，此宋士之录当已失传。又如吴莱（字立夫，浦江人，1297—1340）以龚开所作的文天祥、陆秀夫二传为主干，又“询之故老、征之杂记”，成《桑海遗录》。<sup>④</sup>《桑海遗录》原书今已不见，仅序文留存。再如陈显曾（字景忠，常州人）得知曾祖陈炤（字光伯，常州人，？—1275）入《宋史·忠义传》后，撮录诸公所著其曾祖死难事及入《忠义传》前后问题，合为《昭先录》一卷。<sup>⑤</sup>此书亦已亡佚，我们只能从危素（字太朴，抚

① 永瑯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八十八《集部·总集类三》“忠义集”条，第1078—1079页。《昭忠逸咏》参考《文丞相传》，是笔者比读《文丞相传》与《昭忠逸咏》中记述文天祥事迹的段落的观感。有意思的是，刘麟瑞可能考虑到邓光荐《丞相督府忠义传》的流行，略其所详、详其所略，文天祥诸幕客的生平大节皆付之阙如，而《丞相督府忠义传》着笔甚少的王士敏则记述颇丰。

② 四库馆臣见《昭忠录》未著姓名，仅据是书内容推测其乃宋遗民入元之作，见永瑯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五十七《史部·传记类一》“昭忠录”条，第522页。但稍稍比读《昭忠逸咏》与《昭忠录》，即可知晓后者乃前者志事部分的抽本。

③ 吴澄：《吴文正公集》（元人文集珍本丛刊影印明成化本）卷三十五《詹统制墓表》，18页上。

④ 吴莱：《颖渊吴先生文集》（四部丛刊初编影印明嘉靖元年祝鸾重刊元本）卷十二《桑海遗录序》，第1页上—2页下。

⑤ 危素：《危太朴文集》（元人文集珍本丛刊影印嘉业堂丛书本）卷七《昭先小录序》，第445页。

州金溪人,1303—1372)的《昭先小录序》窥其大概。<sup>①</sup>

上述忠宋节士的合传、专传皆为民间私修,除《昭先录》、《草莽私乘》外皆在《宋史》纂修之前成书。他们选取的忠宋节士无一例外都是采用举义抗元和死节殉国的激烈方式表达忠义的。这种标准当源自正史《忠义传》只书杀身死节的书写传统。<sup>②</sup>无论依据作者的自述还是观者的序跋,我们都能够清楚地看到:终元之世,人们都普遍相信为忠宋节士私相立传可以达到三重功用。第一,表忠义之人,彰宋养士之功。第二,存忠义之事,备正史之采择。第三,赞忠义之行,助明时之风教。民间为忠宋节士立传的标准与意义,甚至撰写的传文,在至正三年(1343)开局、至正五年成书的宋、辽、金三史之《宋史》中得到相当程度的贯彻。这多少得益于三史开局时诸儒臣史官集议的义例:金、宋死节之臣,皆合立传,不须避忌。<sup>③</sup>负责《宋史·忠义传》的余阙(字廷心,唐兀人,1303—1358)与危素不仅深入民间搜访遗闻遗书,大量参用《文丞相督府忠义传》、《陆君实传》甚至《昭忠逸咏》等私修史传,同时还充分利用董文炳(字彦明,藁城人,1217—1278)随伯颜(Bayan,1236—

---

① 清黄虞稷《千顷堂书目》有著录此书,但未著存佚,见黄虞稷:《千顷堂书目》(瞿凤起、潘景郑整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卷十《传记类》,第287页。

② 正史专立《忠义传》的书写传统肇自《晋书》,其序文正围绕杀身死节展开,见房玄龄等:《晋书》(中华书局点校本)卷八十九《忠义》,第2297—2298页。

③ 脱脱等:《辽史》(中华书局点校本)附录《三史凡例》,第1557页;脱脱等:《宋史》(中华书局点校本)卷四百四十六《忠义一》,第13150页。

1295)平宋时收归国史院史库的南宋国史旧本。<sup>①</sup>

最值得注意的是《宋史·忠义传》的序文。序文由首尾两段组成。首段力赞宋人的忠义气节得自本朝的士夫之倡。尾段则详述忠义传书写根据五等十小类的死节、死事标准，“以类附从、定为等差”<sup>②</sup>。五等标准中第一、第二、第三和第五等皆为死事，第四等却是隐逸，“若夫世变沦胥，毁

① 危素：《危太朴文集》卷七《昭先小录序》，第445页。董文炳接收南宋国史旧本之事，见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姚景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卷十四《董文炳》，第276页。《宋史·忠义传》参用《文丞相督府忠义传》的看法，见杨士奇：《东里集》卷十《跋〈文丞相督府忠义传〉》，第152页。具体例证见脱脱等：《宋史》卷四百五十四《忠义九》，第13350—13356页。《忠义传》参用《陆君实传》、《忠义集》是笔者的观感。四库馆臣认为收录《昭忠逸咏》的《忠义集》元时并未流传，更坚持认为抽取《昭忠逸咏》的《昭忠录》只是民间传录，未曾上达史馆。他们的主要依据是《忠义集》直到明弘治中才由何乔新刻梓，《宋史·忠义传》中的谢枋得、张世杰、林空斋诸传不及《昭忠录》记载翔实准确，袁桷、苏天爵建言史馆搜访的遗书书目亦未提及《昭忠录》。其实袁桷建言中提及的书目皆为载述北宋一朝政事典章、人物文献的史料，自然不会言及两书，见袁桷：《清容居士集》（四部丛刊初编影印元刊本）卷四十一《修辽金宋史搜访遗书条列事状》，第31页上—40页下；袁桷：《袁桷集校注》（杨亮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卷四十一《修辽金宋史搜访遗书条列事状》，第1844—1850页。苏天爵未具体言及南宋未造诸事，更不会言及两书，见苏天爵：《滋溪文稿》（陈高华、孟繁清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卷二十五《杂著·三史质疑》，第421—427页。《宋史·忠义传》中的谢枋得、张世杰、林空斋诸传不及《昭忠录》记载翔实是事实，但不能因为元朝史官的笔削或舛误就彻底否定没有参用。事实上，林空斋传的讹误，在其妹林氏传中已有更正，恰能说明参用过《昭忠逸咏》，见脱脱等：《宋史》卷四百五十二《忠义七·林空斋传》，第13309页；卷四百六十《列女·林氏》，第13492—13493页。明人郭万程（嘉靖年间人）对林氏忠义之事早有详细的考述，见黄宗羲编《明文海》（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卷四百二十八《传四十二·宋石塘林氏世传》，第4473—4478页。另一铁证是《宋史·忠义传七》的吴楚材传。吴楚材的传记在元代的文献中皆隐讳不书，仅有《宋史》与《昭忠逸咏》载述，两书传文大段雷同，显系《宋史》参用之故，见脱脱等：《宋史》卷四百五十二卷《忠义七·吴楚材传》，第13311—13312页；赵景良编《忠义集》卷《昭忠逸咏》“大社吴公”条，第5页上—6页下。

② 脱脱等：《宋史》卷四百四十六《忠义一》，第13150页。五等十小类忠义标准的具体分析，可参本书第一章第三节。

迹冥遁，能以贞厉保厥初心，抑又其次欤！”但详考《宋史·忠义传》正文，隐逸者仅四人：张山翁（字君寿，普州人）、黄申（字酉卿，井研人，1220—1291）皆是不书降状，险些被杀，最后隐居山林；何时（字了翁，抚州乐安人，？—1285）、陈子敬（赣州人）则是举兵抗元失败隐遁。他们的忠义其实还是以誓死抗元的激烈方式表达的。因此，《宋史·忠义传》的书写理念虽然可能受时代观念或成文传记的影响，突破前史忠义传与隐逸传分隔的畛域，但立传标准仍然遵循《忠义传》的传统。<sup>①</sup>真正树立起隐逸亦忠义的遗民传典范的是明程敏政（字克勤，休宁人，1445—？）成化十五年（1470）编成的十二卷《宋遗民录》。<sup>②</sup>

① 全祖望早已注意到《宋史·忠义传》虽在理念上突破传统忠义传与隐逸传、生死之节的畛域，但实际仍遵循忠义传的书写传统，仅收录死节之士，“惟《宋史·忠义传》序有云：‘世变沦胥，晦迹冥遁，能以贞厉保厥初心，抑又其次……以类附从’。斯真发前人未发之蒙。然而列传十卷，仍祇及死绥仗节诸君，未尝载谢翱、郑思肖只字”，全祖望：《全祖望集汇校集注》（朱铸禹汇校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之《鮑琦亭集外编》卷四十二《移明史馆帖子五》，第1650—1652页。

② 程敏政：《篁墩文集》（明正德五年序刊本）卷二十一《宋遗民录序》，第15页上—16页下；《宋遗民录》卷首《宋遗民录序》，第1页上—4页上。《宋遗民录》对原序有所窜改。尤其是将原文“十二卷”窜改为“十五卷”。这一窜改的主因是程威等在嘉靖年间刊刻的《宋遗民录》所据的底本是程氏族人程曾校补的十五卷。目前学界有关遗民传的典范问题，意见有三。一种主张是程敏政的《宋遗民录》，以谢正光为代表，见谢正光：《清初所见“遗民录”之编撰与流传》，原载《新亚学报》十五卷（1986年8月），收入氏著：《明遗民传记资料索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17页。一种主张是汲古阁一卷本洪武年间的《宋遗民录》，以钱仲联为代表，见钱仲联：《明遗民录汇辑序》，《铁道师范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1993年第3期。但潘承玉、吴艳玲先生检考文献后力指此书乃伪书，见潘承玉、吴艳玲：《汲古阁一卷本〈宋遗民录〉伪书考》，《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6年第2期。潘先生在此文中亦主张程敏政的《宋遗民录》乃一代遗民事迹总录的嚆矢。但在2003年的旧文中，他采信钱谦益之说，将元吴莱的《桑海遗录》视做最早的遗民录，此为第三种主张，见潘承玉：“更考遗民删作伴，不须牛侏辱墙东”：清初《遗民录》编撰与遗民价值观新考》，《成大中文学报》第十一期（2003年），第111—146页。但正如笔者前文所述，吴莱的《桑海遗录》是以文天祥、陆秀夫为主体的史传，并非是以遗民为对象，故不能作如是观。

“遗民”一词三代汉唐早已行用,最初大致指称世变子遗的故国、故地子民或胤裔。<sup>①</sup>行至中唐北宋,文士化用陶渊明的“葛天氏之民”为“葛天(氏)之遗民”,“遗民”同“逸民”相融,喻指遗身世外的隐逸士者。<sup>②</sup>北宋覆灭,中原沦陷,北方民众遂成偏安江南的南宋朝廷的“遗民”。在南宋儒士大夫的意象中,他们都是思宋、忠宋的子民。与此同时,陶渊明忠心晋室、不仕二姓的隐逸形象在南宋儒士尤其是理学家的建构下成型。<sup>③</sup>“遗民”在继续涵括原来两种形象的同时,开始染有忠义的色彩。迨入元初,南方儒士的诗文中不仅大量出现“遗民”的字眼,而且不少人自称遗民。<sup>④</sup>王应麟(字伯厚,鄞县人,1223—1296)在给舒岳祥(字景薛,宁海人,1219—1298)《閩风集》所作的序文末不书年号,自署“遗

① 如人们熟知的“殷遗民”,见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点校本)卷四《周本纪第四》,第133页;“陶唐氏之遗民”,见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十三经注疏整理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卷三十九《襄公二十九年》,第1264页。方勇曾简单梳理过“遗民”概念,见方勇:《宋遗民诗人群体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导言,第1页。赵园亦以明遗民的思想言论为中心,述说“遗民”与“遗民史”,见赵园:《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下编第五章,第257—288页。

② “葛天之遗民”,见白居易:《白居易集》(顾学颉校点,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卷三十六《不出门》,第825页;“葛天氏之遗民”,见苏轼:《苏轼文集》(孔凡礼校点,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卷一《菜羹赋》。“葛天氏之民”,见陶渊明:《陶渊明集》(逯钦立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卷五《五柳先生传》,第175页。《五柳先生传》一直被视作陶渊明的自传,“葛天氏之民”化作“葛天之遗民”,“遗民”自然蕴有遗身世外的隐士之含义。有关陶渊明隐士形象与《五柳先生传》复杂关系的研究,可参田晓菲:《尘几集:陶渊明与手抄本文化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二章,第53—82页。

③ 可参李剑锋:《元前陶渊明接受史》(济南:齐鲁书社,2002年)第四编第一章,第347—362页。

④ 潘承玉先生为说明清初遗民诗作中“遗民”之多,特指出元初南方儒士的诗作中鲜见,此显然想当然耳,见潘承玉:《“更考遗民删作伴,不须牛侏辱墙东”:清初〈遗民录〉编撰与遗民价值观新考》,第122页。

民”<sup>①</sup>。吴澄、刘将孙(字尚友,庐陵人,1257—?)、袁桷(字庆长,鄞县人,1266—1327)等书题故宋帝王文物时亦皆自书“遗民”<sup>②</sup>。

不过,王应麟、吴澄、袁桷在元至明前期儒士心目中主要以儒学见长。他们基本被放入新《儒林传》的书写传统中,塑造成儒学正士。《宋史·儒林传》本诸朱熹(字元晦,婺源人,1130—1200)《伊洛渊源录》的写作理念,分立《道学传》与《儒林传》。《道学传》上溯周、程、张、邵五先生,中涉程氏门人与朱熹、张栻(字敬甫,绵竹人,1133—1180),下及朱子亲炙门人,宋末元初南方儒士自然没有入选。《儒林传》则收录有两名宋末元初儒士,一是黄震(字东发,余姚人,1213—1281),另一位就是王应麟。<sup>③</sup>袁桷文史兼通,是元朝知名的词臣。他同程鉅夫(名文海,以字行,1249—1318)、赵孟頫(字子昂,吴兴人,1254—1322)、邓文原(字善之,绵竹人,1258—1328)等元初儒臣被纂修《元史》的明初史官归入同卷。<sup>④</sup>《元史》合儒林、文苑两传为《儒学传》,名登其列者大多是宋末

① “旃蒙协洽岁围阳月既望,浚仪遗民王应麟序”,见舒岳祥:《闰风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首,第3下。此序嘉业堂丛书本《闰风集》并未收录。有关《闰风集》的版本,可参张常民:《南宋遗民舒岳祥〈闰风集〉版本考》,《新世纪图书馆》2009年第3期。

② 吴澄:《吴文正公集》卷三十一《题宋列圣御容》,第4页上。刘将孙:《养吾斋集》(四库全书珍本初集)卷二十六《题阜陵御书二十八将论》,第1页下;刘将孙:《刘将孙集》(李鸣等校点,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9年)卷二十六《题阜陵御书二十八将论》,第209页;袁桷:《清容居士集》卷四十七《书艺祖皇帝十节度风云图后》,第12页下。

③ 脱脱等:《宋史》卷四百三十八《儒林八》,第12987—12994页。

④ 宋濂等:《元史》(中华书局点校本)卷一百七十二《袁桷传》,第4025—4026页。

元初南方儒士。<sup>①</sup>《元史·儒学传》大抵取材自诸儒的行状、墓志铭。<sup>②</sup>吴澄没后数载,即被推许为羽翼群经,同皇庆二年(1313)早已从祀孔庙的元儒许衡(字仲平,河内人,1209—1281)并起接续道统的真儒。明前期官方敕修的经史著述,如《元史》、《五经大全》都非常肯定吴澄的儒学道统地位。不少儒臣数次示意朝廷准其从祀孔庙,明宣德十年(1435)终获成功。<sup>③</sup>成化四年(1468),黎温(抚州临川人)仿《伊洛渊源录》体例编刻《历代道学统宗渊源问对》,先述生平事迹,再表言行称述。他将吴澄塑成直躐朱子的经儒,“盖澄学问之功,自朱子以来莫或过之”<sup>④</sup>。成化十二年敕修的《续资治通鉴纲目》及时人的发明议论亦许其为道学真儒。<sup>⑤</sup>

① 他们是金履祥(字吉父,兰溪人,1232—1303)、陈栎(字寿翁,休宁人,1252—1334)、胡一桂(字庭芳,婺源人,1247—?)、胡炳文(字仲虎,婺源人,1250—1333)、黄泽(字楚望,江州人)、胡长孺(字汲仲,永康人,1240—1314)、熊朋来(字与可,富州人,1246—1323)、戴表元(字帅初,奉化人,1244—1310)、牟应龙(字伯成,吴兴人,1247—1324)、郑滁孙(字景欧,滁州人)及其弟郑陶孙(字景潜)、陈孚(字刚中,临海人,1240—1303)、冯子振(字海粟,攸州人,1257—1314)、董朴(字太初,顺德人,1232?—1316?)、龙仁夫(字观夫,吉安人,1251—?)、刘岳申、韩性(字明善,绍兴人,1266—1341)、陆文圭(字子方,江阴人,1256?—1340?)、周仁荣(字本心,宁海人,1265?—1325?),见宋濂等:《元史》卷。还有数人在1270年左右出生,如许谦(字益之,金华人,1268)、杨载(字仲弘,浦城人,1271—1323)、刘洗(字桂翁,吉水人,1268—1350)、程端礼(字敬叔,庆元人,1271—1345)。

② 可参方龄贵:《〈元史〉纂修考》,收入氏著:《元史丛考》(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年),第43—44页。

③ 有关吴澄从祀孔庙的经过,可参朱鸿林:《元儒吴澄从祀孔庙的历程与时代意涵》,《亚洲研究》第二十三期(1997年),第269—320页。

④ 黎温:《历代道学统宗渊源问对》(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明成化四年刘氏日新堂刻本)卷六《许氏吴氏》,第6页。可参荒木见悟:《道统论的衰退与新儒林传的展开》,中译文见吴震、吾妻重二主编《思想与文献:日本学者宋明儒学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5—16页。

⑤ 见朱鸿林:《元儒吴澄从祀孔庙的历程与时代意涵》,《亚洲研究》第二十三期,第281—283页。

但《续资治通鉴纲目》受政治气候与民间士论的影响采行严苛的夷夏观，将元朝斥为“胡元”，虽未直接否定其正统，却带动严守夷夏之防、排斥元朝正统观念的风行。<sup>①</sup>吴澄等人塑造已久的儒学正士形象随着这种新的夷夏观与正统观的风行也开始重构。

王应麟、吴澄等亦非程敏政心目中的“宋遗民”。程敏政理想中的“宋遗民”是生祭文天祥的王炎午（字鼎翁，安福人，1252—1324）、登西台恸哭的谢翱（字皋羽，福安人，1249—1295）和收宋诸帝遗骸的唐珏（字玉潜，山阴人，1247—？）三子。此三子名不载史，著述沦亡，他们的言行大多只见诸他人的文集。程敏政广搜诸人文集中所见三子的传记称述、诗作唱和，成正文六卷；又广搜同三子意气相与的方凤（字韶卿，浦江人，1241—1322）、吴思齐（字子善，永康人，1238—1301）、汪元量（字大有，钱塘人，1247—1317？）、梁栋（字隆吉，湘州人，1242—1305）、林景熙（字德旸，平阳人，1242—1301）五人的言行唱和成附录五卷，末卷附元主为宋裔之说。整篇《宋遗民录序》亦围绕三子展开。在程敏政看来，三子皆以布衣身份参幕文天祥督府，深知苟且容身不如引刀一快，但因身系纲常，“故宁为管宁、陶潜之贫贱而不悔者”。他们身系的纲常并不只是君臣之义，而是天理民彝。哀辑三子及其相与之人的唱和称述不仅可以表宋待士之厚、贻谋之善之报，起人心之忠义、振末世之萎靡，而且能够见天理民彝之不可泯。<sup>②</sup>程敏政拈出天理观，赋予书写宋遗民言行事迹更深厚的政治文化意义。《宋遗民录》因此超越《忠

<sup>①</sup> 有关《续资治通鉴纲目》的夷夏观问题，可参王秀丽：《明代〈续资治通鉴纲目〉研究》（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2005 年博士论文）。

<sup>②</sup> 程敏政：《篁墩文集》卷二十一《宋遗民录序》，第 15 页上—16 页下。

义传》的书写传统,不再只关注国变时赴难就死的忠臣义士,而是扩展至元初隐逸忠宋的南方儒士,开创遗民录的新典范。

值得一提的是,程敏政心目中的“宋遗民”在元及明前期大多也是以儒学见长,归入儒林传的。如宋濂(字景濂,浦江人,1310—1381)在《浦阳人物记》中虽然清楚写到方凤同“气节不群”的谢翱、吴思齐同声相应,但仍将其归入“文学”。<sup>①</sup>也就是说,《宋遗民录》同时打破的还有忠义传与儒林传分隔的畛域。当然,程的天理观与遗民录的基础仍是忠义观与《忠义传》。《宋遗民录》以三子为中心,某种程度上是因为程敏政认定三人乃文天祥幕客。方凤等人能够附入则是因为他们同三子意气相与、唱和称述。这种实在的宾主、朋友关系构成忠义传向遗民传迈进的重要根基,但程对构建根基的文集资料没有进行任何校订考证。后来者便沿着征引相关史料、校证文字和扩展人际网络、增补人物的两条路径继续前行。

《宋遗民录》成化十五年编成后并未梓行。程敏政死后,其族人程曾(字师鲁,休宁人)参考《正德姑苏志》等方志史料,增入张弘毅(字毅夫,庐陵人)、郑思肖(字忆翁,连江人,1241—1318)、龚开三人的传记著述,共计十一人,将之校补成十五卷。<sup>②</sup>嘉靖二年(1523),族人程威首

① 宋濂:《浦阳人物记》(清乾隆五十五年歙县鲍氏知不足斋丛书本)下卷《文学》“方凤”条,第12页上—14页上。

② 程曾所补三卷到底是哪三卷,因无程敏政原稿,很难得知。但据程敏政序言所讲,“一时相与者,又皆慷慨悲歌之士,或唱和焉,或称述焉”。卷七《张毅夫》、卷十《龚圣予》、卷十三《郑思肖》,此三人同三子皆无唱和称述。且卷十、卷十三两卷的首要史料是《姑苏志》,而《姑苏志》直到正德元年方才成书,故此三卷最有可能是程曾后来补入。

倡刊刻,但只刻出目录、卷一《王炎午》。次年,邑人孙志(字道甫)助梓卷十《龚开》,戴勉(字以立)刻卷六《唐玉潜》。四年,族人程思柔及程敏政从子程本一合力完刻。<sup>①</sup>十五卷本《宋遗民录》逐渐流传开来。陈霆(字声伯,德清人,1477?—1550)、郎瑛(字仁保,仁和人,1487—1566)皆在嘉靖年间私著的笔记中抄录补证。<sup>②</sup>进入万历年间,严从简的《殊域周咨录》、张元忭(字子盖,山阴人,1538—1588)的《万历会稽县志》及《万历绍兴府志》、胡应麟(字元瑞,兰溪人,1551—1602)的《诗薮》都有摭取采录。

崇祯年间,《宋遗民录》流行更盛。毛晋(字子晋,常熟人,1599—1659)不仅影写十五卷嘉靖本《宋遗民录》,而且还觅到一卷本《宋遗民录》,将之刻入汲古阁合刻唐宋元诗五集丛书的《忠义集》之后。<sup>③</sup>钱谦益(字受之,常熟人,1582—1664)万历年间读到吴莱的《桑海遗录序》后,知晓龚开曾撰文天祥、陆秀夫两传。当时他只听说陶宗仪的《草莽私乘》。万历四十七年(1620)在李贯之(字如一,江阴人)家终借得《草莽私乘》钞本抄录一通,题曰:《重辑桑海遗录》。<sup>④</sup>但到崇祯十六年左右(1643),他已经得到十五卷嘉靖刻本《宋遗民录》。钱氏对此本评价不高,“殆未成之书。今流俗所刊本,乃是后人自以其

① 程敏政:《宋遗民录》卷首《程威书》,第4页下;卷七《唐玉潜》,第15页下;卷十《龚开》,第18页下;卷末《书宋遗民录刻后》,第1页上—2页下。

② 陈霆:《两山墨谈》(民国嘉业堂丛书本)卷十七,第4页上—4页下;郎瑛:《七修类稿》(安越点校,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年)卷二十七《辩证》“西江月”条,第334页。

③ 佚名辑:《宋遗民录》(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印明崇祯虞山毛氏汲古阁合订唐宋元诗五集本),第765页。

④ 钱谦益:《牧斋初学集》(钱曾笺注、钱仲联标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卷二十八《重辑桑海遗录序》,第846—848页。